

『让爸爸看到我的才艺是一种幸福』

## 一名留守儿童的工地暑假

8月3日6点30分，空气里弥漫着炙热而潮湿的气息，低沉的气压让人有点喘不过气。在北京市丰台科技园36号地项目工地，李明一结束工作就回到宿舍里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晚上，我女儿要表演节目。”

李明的女儿叫李果，今年12岁，是陕西汉中西乡的一名初一学生。“为了不让女儿当留守儿童，我坚持让妻子在家带孩子读书。”李明告诉记者，他外出打工十多年，一直在各地辗转，女儿放暑假也很少有团聚的机会。这是他和女儿共同度过的第一个暑假。

他告诉记者，女儿参加的演出是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民政部、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北京市农村留守儿童联席会议、民政局和中建二局承办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百场宣讲进工地”活动的一部分，“为了这个活动，女儿带着几名工友的孩子排练了整整十几天。”

在闷热的生活区排练节目，对于十几名孩子来说，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这些孩子却兴趣十足。“能让爸爸看到我的才艺也是一种幸福。”李果告诉记者，因为和父亲聚少离多。来到北京的这段时间，她除了去看了天安门和故宫之外，就一直陪伴在父亲旁边。“很小的时候不能理解为什么他要外出工作。一次，他受伤回家休养，我才明白其中的艰辛。”说着，眼中就泛起了泪花。

“这是我度过的第一个幸福而充实的暑假。”李果告诉记者，她自编自演的舞蹈灵感来自于一名留守儿童对于父母的思念，她想把内心最想说的话都通过舞蹈告诉父亲。

“我们工地上有很多工友和孩子长期分离，其子女留在农村由长辈或亲属抚养，聚少离多，能有机会把他们接到项目工地来感受一下父亲的工作场景和状态，增进了解，不仅能让孩子有更多的获得感，还能提高工友的归属感。”中建二局三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纪委书记毛锦说，解决好留守儿童暑期问题，对于建筑企业来说，也是发挥工会娘家人作用的一项实实在在的举措。

北京市政局党委常委、副局长李红兵说，留守的儿童父母为首都建设奉献了力量，为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做出了很大牺牲。他呼吁政府和社会各界也要为留守儿童提供更多机会，让他们体会到社会的关爱，感受到父母的关心和爱护。

## 呼和浩特：将建三项制度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

本报讯(记者 李玉波)记者从呼和浩特市住建委获悉，为落实呼和浩特建设领域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预防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发生，呼和浩特将制定建立建设领域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三项制度，对存在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的建筑业企业将加大处罚力度，采取列入“黑名单”、限制市场准入等惩戒措施，情节严重的降低资质等级。

据了解，建设领域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三项制度分别为：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与工程款分账管理制度，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管理制度，建设领域银行按月代发农民工工资制度。呼和浩特市住建委要求呼和浩特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过程中，实行人工费(工资款)与其他工程款分账管理，施工总承包企业(包括直接承包建设单位发包工程的专业承包企业，下同)设立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以下简称“工资专户”)，建设单位按照合同约定将应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工资款)拨付至工资专用账户。

对劳务承包行为的劳务用工，施工总承包企业要进行劳务人员实名登记造册，名册作为支付劳务费的基本依据，至少保存3年备查。要求施工劳务企业要委托银行代发农民工工资(劳务费)，对不落实的用工企业，列入“黑名单”等措施督促落实、依法处理。

## 工地装上“智慧”大脑

本报讯(通讯员何攀 黄诗尧)“刷脸”即可进出工地、无人机全方位监控施工过程、基坑支撑轴力监测系统实现监测数据可视化、烟感联动系统显示具体感应位置……走进中铁十一局天津地铁10号线江湾二街站，呈现在眼前的是32个智慧管控亮点。运用云计算、互联网、大数据等前沿科技精心打造的“智慧工地”让人感受到科技在施工上的运用和创造。

“智慧工地”通俗讲就是利用可控化、数据化以及可视化的智能系统对项目进行全方位立体化的实时监管。这不仅大大提高了工地施工的安全性、环保性，也大大降低了施工成本。通过循环水池的使用，可以把降水井里的水集中起来，用于洒水降尘、冲车等；在现场安装的钢筋数控加工设备，不仅可降低人工成本，还提升加工质量和工作效率。

## 工人高温下更换重伤道岔保安全

7月28日，九江地区连续出现36℃以上的高温，九江桥工段的工人正在京九铁路德安区段更换重伤道岔。在高温之下，九江桥工段组织人员对探伤过程中发现的京九铁路德安区段的重伤道岔进行更换。为降低对列车运行的影响，换轨施工要在120分钟内完成。时间紧、任务重，工人们冒着高温争分夺秒，顺利完成了更换道岔施工任务。

胡国林 王浩 摄

本报记者从九江市铁路部门了解到，此次更换重伤道岔，预计耗时约120分钟，确保京九铁路安全畅通。

目前，九江市铁路部门正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确保施工安全有序进行。

本报记者 赵剑影

本报通讯员 施婷 马阳

江西高安汽运产业规模位居全国县级市之首，货车司机近20万人，本地人占比30%~40%

# “奔波在路上，一辆车就是一个家”

本报记者 卢翔  
本报通讯员 刘嘉玲

“高安汽运遍天下，有路就有高安车。”在素有“中国物流汽运之都”之称的江西省高安市，汽运产业规模和知名度位居全国县级市之首。据统计，高安市大小货车遍布全国，货车司机近20万人，本地人占比30%~40%。

这些货运司机常年奔走在路上，8月1日，《工人日报》记者来到高安市，走近这群货运司机，听他们讲述车上的生活。

## 一辆车扛起一个小家

额头豆大的汗珠不断滴下，满身褶皱的休闲装已被汗水浸湿，双眼还能看到几条倔强的红血丝。初见陈亮时，他刚刚结束一场长途货运，脸上还带着几分倦意。

“我读书不行，初中毕业就辍学了。”陈亮告诉记者，由于年纪小，辍学在家也干不了重活，只能给家里增添负担。他只好背起行囊和同乡人一起踏上外出打工之路。但背井离乡的生活并不好过，由于文化水平不高，在外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没有文化只能干一些粗活重活，工资待遇特别低。”

上世纪90年代，正当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之时，陈亮听闻不少同乡返乡搞起了汽运，“当时，正逢高安市搞汽运创业，很多人加入，生活发生了不

小的改变。”陈亮告诉记者，他听到这个消息觉得是一个好机会，就跟着返乡了。“当时想着搏一把，如果不行就再去打工。”

“结果一回来就没再出去了，一家人的生计都绑在了这辆车上。”陈亮说，今年刚刚30出头的他已经10年的驾龄，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老司机。成家后，陈亮把手教会了妻子开货车，带着她一起上路，如今货车已经成为他的第二个家。

“开汽运练的是耐力和精力，一个人开车没人搭把手，很辛苦。另外雇司机成本又太高，和老婆一起跑货运，不仅减少了开支，相互之间还能有个照应，一举两得。”说起这个决定，陈亮觉得很正确。

一年到头多数时间都奔波在路上，一辆车就是一个家。眼看着妻子白皙的皮肤变成了和自己一样的“包公脸”，陈亮很是心疼，“她的付出我一直都看在眼里”。多年来风雨兼程，夫妻两人相濡以沫、互相支持，默默经营自己的小家。

## 一辆车载起有滋味的生活

“我听说跑长途很赚钱，就跟着师傅入了门。”来自高安市灰埠镇梅湖行政村的简荣辉今年40岁，已经跑了20多年货运。在高安市，像简荣辉这样坚守一份工作不换的货车司机不计其数。

相较于其他货车司机，简荣辉是幸运的。由于离家较近，他有很多空闲时间陪在老婆孩子身边，“每次跑车回家，还没进门就听到孩子边跑边喊着‘爸爸回来了’，这种感觉让我很安心。”简荣辉一

脸幸福地告诉记者，这引得不少同行羡慕。

简荣辉和陈亮不同，有了孩子之后，他就一个在外挣钱，家里的事情统统交给妻子打理。妻子是他的“贤内助”。“他之前开车都是一个人天南海北地到处跑，最辛苦的就是晚上睡觉不敢睡熟，还要警惕着货物被偷。晚上睡不好，白天开车很危险。”简荣辉的妻子王燕告诉记者，由于长期跑货运的缘故，丈夫睡眠变得特别浅，有一丝杂声就能立刻醒来。

回想起以前单打独斗的日子，简荣辉十分感慨：“年轻时有股冲劲，干什么都不害怕。现在有了孩子，我开车更加小心。”为了让妻子放心，他开始带起了徒弟，在路上两个人相互做伴，有事情也能搭把手。

去年，简荣辉用跑货运的积蓄在城里买了一套房子，一家人的生活也逐渐变得宽裕起来。这让他感到很欣慰：“以后生活会更加有滋有味的。”

## 一辆车聚起一个大家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高安市共有2500余家物流企业，其中，大型公路铁路联运物流企业1家，省级服务业龙头企业5家，国家4A级物流企业29家，数量位居全国县市之首，占据江西省4A级以上汽运物流企业的三分之一以上。拥有10余万辆营运货车、运力超过120万吨、2000多个物流信息网点。

规模大，公司众多，货运司机更是个庞大的群体，在高安市，像简荣辉和陈亮这样的从业者有近

20万。如何在管理上做到有条不紊、秩序井然？今年7月，高安市成立了汽运产业协会司机之家，“之前由于货运司机多，很多司机无序化竞争，货难找、车难开、乱收费等问题时有发生。我们希望通过建立司机之家解决这些问题。”高安汽运集团副会长刘炜甲告诉记者，“我们通过一辆辆车聚起一个大家，司机与集团不存在雇佣关系，而是一种租赁的合作形式，进行协调和统筹货源、司机资源。”

“高安汽运物流产业规范化之后能让司机有更好的平台，有更多选择的机会，既能挣到钱又能照顾家庭，还能有效解决了留守问题。”刘炜甲说，创办汽运产业协会司机之家的初衷是为鼓励在外务工人员返乡创业，让他们能在家门口解决就业问题。司机之家的正式成立实现了对1773家货运企业的覆盖。

“加入司机之家后，无序竞争少了，工作起来更有效率了，收入也更可观了。”简荣辉说，现如今，他头痛的问题都不存在了，闲时还能耕种几亩田地，加上跑货运的收入，一年下来毛收入能达到十几万元。

此外，高安市通过互联网职工服务平台建设，借助信息化的手段，利用互联网手机版和网络版两种形式，使用“互联网+”交通模式，对接货运司机服务需求，使广大货运司机享受加油、修车、货运信息、法律援助、心理咨询、导航定位、路况实时动态、路线语音导航推荐等多方面在线服务和优惠，在全国范围内为广大货运司机提供更加优质温馨服务。

## 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助力脱贫

本报讯(记者 甘皙)8月2日，第176场银行业例行新闻发布会在京召开，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介绍了该行专注发展小额贷款业务，全力推进金融精准扶贫的举措和成效。

邮储银行高度重视扶贫工作，致力于探索精准扶贫的有效方式，全力助推打赢脱贫攻坚战。自2007年以来，邮储银行长期扎根农村，贴近农户，重点在收支支农小上下功夫，一直专注于小额贷款业务，是国内最早开发纯信用、无抵押小额贷款产品的金融机构，也是国内小额贷款服务的主要提供者。十年多来，邮储银行累计发放小额贷款近1.54万亿元，服务农户超过1000万户。

党中央作出脱贫攻坚决策部署之后，邮储银行在充分结合自身实际的基础上，做好小贷款，助力大扶贫，在具体工作中总结形成了一些有效的做法，推动金融扶贫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绩。

突出“两个坚持”，发挥金融扶贫专业优势。邮储银行充分发挥网络、资金和小额贷款专业优势，坚持“真扶贫、扶真贫”，推动25万建档立卡贫困户享受到扶贫金融服务，坚持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支持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等，带动319万户贫困户脱贫。

抓牢三级机制，强化金融扶贫落地见效。邮储银行建立了总行统筹、省行负责、市县支行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强化各级一把手第一责任，推动金融扶贫工作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截至6月末，累计发放扶贫小额贷款近80亿元；累计发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1235亿元，服务43万人次。



返乡认种红苗谷 走上脱贫致富路

## 高温持续“侵袭”京城

# 户外劳动者享高温津贴

放在街道的另一侧，休息的时候才能喝上几口。秦师傅告诉笔者，他们收到了祛暑药品、茶叶等物品，高温津贴金额有160元。

除了环卫工人，快递员的日子也很辛苦。在德外小区，一位天天快递的快递员正光着膀子搬运快件，汗珠止不住地流下来，“我们发了高温补助，大概180元。这天气，有电梯的楼房还好，没有电梯的老楼每次得爬楼梯上去，一趟下来就得汗流浃背。”快递员一边熟练地给快件打着胶带一边说，“每天7点到

公司拿件，基本上七八十件，多的时候100多件，根本没有时间休息。”

走访中，笔者发现，由于高温津贴和工资一块发放，很多单位没有做明确标注，不少劳动者并不知道高温补贴发放情况。一些零工作者由于没有固定单位，更是无法享受此福利。

近日，北京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以上。根据北京市相关文件规定，35摄氏度(含35摄氏度)以上，室外露天作业人员高温津贴调整为每人每

月不低于180元；室内33摄氏度(含33摄氏度)以上，不低于120元。此外，用人单位应当为从事高温作业、高温天气作业的劳动者提供防暑降温饮料和必需药品。

且规定“饮料不能替代防暑降温饮料和必需药品，防暑降温饮料和必需药品也不得充抵高温津贴。”

人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高温津贴属于劳动报酬(工资)的组成部分，该发而不发属违法行为，最高面临1万元罚款。职工如果未按规定领取到高温津贴，可以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投诉。

## 农民工下班途中跳车意外死亡被认定为劳务受损

法院认为，应视为从事由雇主指示安排的雇佣活动的延续，按双方过错确定责任分担

本报记者 吴铎思

日前，福建省福安市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特殊的涉及农民工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件。农民工曹某下班途中跳车意外死亡，法院判定雇主因未给雇员提供必要的安全劳务条件，承担50%的赔偿责任。

2017年7月28日，福安某船舶修造公司将渔船船壳的建造工程发包给包工头杨某。杨某便雇佣了曹某等人为其建造船壳。2017年3月13日，曹某与其他工友在下班后乘坐由包工头杨某安排的电动三轮车前往饭店用餐，车辆行近目的地时，曹某未等车辆停稳，便擅自从仍在行驶的电动三轮车上跳下，因惯性导致后脑勺着地，头部严重受

创，曹某出现颅内出血、大小便失禁等严重症状，虽在当日便被送往福建省宁德市闽东医院抢救，但因伤情过重，治疗无效，于2017年3月19日死亡。

事故发生后，曹某家属连夜从安徽赶到福安处理善后事宜，但包工头杨某却早已外逃，一直不肯出面，曹某家属亦未能从船舶修造公司处获得理赔，因此将杨某及该船舶修造公司诉至福安市人民法院。

福安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死者曹某受雇于包工头杨某，为其提供劳务，双方形成劳务关系。依据相关规定，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曹某系在下班前往就餐途中发生意外死亡，而非劳务期间，能否认定为因劳务受到损害，系

该案重要争议点，亦为曹某家属能否获得理赔的关键。

案件审理期间，经调取同与死者曹某在杨某处打工的工友刘某、李某、钟某、牟某四人的询问笔录，该四人均提及平日上下班期间均由杨某统一安排电动三轮车接送，并由杨某或代班工头“老曹”驾驶该车辆，吃饭点亦为杨某平日所指定场所。

对此，法院认为，曹某虽于下班途中死亡，但在受雇于杨某期间，与其它雇员一同乘坐由杨某安排的车辆上下班，且车辆由杨某或由杨某雇佣的代班工头“老曹”驾驶，故曹某搭乘由雇主杨某组织安排的电动三轮车下班，仍应视为从事由雇主指示安排的雇佣活动的延续。曹某因劳务死亡，应按双方各自过错确定责任分担。杨某作为

雇主，未为雇员提供必要的安全劳务条件，安排不适宜运输人员的电动三轮车接送不特定数量的雇员上下班，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其行为有过错。而曹某从未停下的电动三轮车上跳下导致受伤死亡，其本身也存在重大过失，故对曹某的死亡，雇主杨某应承担50%的赔偿责任，雇员曹某应自行承担40%的责任。某船舶修造公司将船壳的建造工作交予杨某，双方为承揽合同关系，但杨某不具有船舶修造工程的相应资质和安全生产条件，某船舶修造公司在选任杨某上有一定的过错，应向死者曹某家属承担赔付责任，福安法院确认某船舶修造公司因选任过失承担责任10%的责任为宜。福安市人民法院遂判令杨某向死者曹某家属赔付损失487985.50元，某船舶修造公司向曹某家属赔付损失97597.10元。